

## 成为更多语种文献学的平台

李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首先感谢《文献》编辑部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我本人的研究侧重于梵语和中古印度语佛教文献以及早期汉译佛典,跟正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一定区别,所以我会更侧重于讲跟我自己领域相关的东西。

首先我在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文献》主要是发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论文,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文献学不只是中文传统里有,大部分语种都有自己文献学,虽然可能学科名称略有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让《文献》无所不包,而是说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大国学”的理念,将古丝路胡语文献的研究作为可以考虑的选题。目前国内学者对丝路胡语文献的原创研究成果大多先在国外发表,然后才出口转内销回到国内来,这种情况与国内发表平台有限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大部分西域语言的文献资料都是相对稀缺的,不像中文文献大多可以有好多版本,大家比较哪个版本价值高。而胡语文献常常是连基本的文本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每发现一片新残片或者出现一部新文本,对研究来说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些材料在国内好的发表渠道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文献》能够把胡语文献研究这一块纳入进来的话,可能对于《文献》的国际关注度会有一个提升。

第二点,中国的古典文献学是否应该考虑跟国际相近领域学界接轨和对话的问题。文献学这个词的其中一个英文对应是 philology,也就是常说的语文学。我们知道,语文学传统在西方学术传统里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学术范式一直在不断丰富、推陈出新。比方说,一开始语文学的核心关注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不断试图利用不同的写本与刊本去重构一个最接近原始形态的本子。但随着研究的展开,前述系谱学方法的一些核心原则开始受到挑战。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在很多前现代文献中(例如欧洲中世纪文献、史诗、印度佛教经典等等),同一著作的异读中存在着纵向异读和横向异读,不同异读并不总是错误抄写导致的。而在历史上,这些文献本身并不稳定,可以被持续不断地增删、改写甚至重写。这时最初的作者便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种著作的传抄或口传过程更像一个“创作的工作坊”。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献可能并不存在唯一的“原始文本”,或者说其“原始文本”有存在多元性的可

能。而若按照语文学的传统校勘方法则可能重构出来一个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此外,上述的方法都可视为历时性的研究。还有所谓新语文学,提倡对文本共时性的研究,主张不应被作者束缚,而应更多地关注写卷或刊本本身,如其中的视觉图像、注释、标题、插入及其背后观念、审美趣味、意识形态等等的变迁。让写本获得自身的生命,走入新语境、获得新意义,而不是作为原作者和原始文本的附属品存在。

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传统的文献校勘等等,在方法上也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以前难以在纸面上实现的校勘方式,现在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予以兼顾。学界曾识别出包括影印本、抄录本、最佳手稿本、综览本、折衷本、精校本等诸多文献整理方法,这些方法有时各有利弊,但却很难在同一部纸质书籍中方便地实现。但有了计算机之后,则使全方位呈现不同写本并兼顾不同校勘方法成为可能。也正是由于电子文本的经济性,且不必拘泥于纸质出版时既定的呈现方式,而是可以让不同读者都能够民主平等地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文本的呈现、校勘和研究的方式,并共同参与和完善对文本的校订与注释。例如莱顿大学的Silk教授近年开始提倡所谓“开放语文学”(open philology)。该项目在理念上将每一个传本都平等地视为作品的不同见证,来否定传统的文本“优生学”。项目所开发出的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设置参数,来安排文本和异读的呈现方式和排列顺序,用户也可以选择参考编辑者所重构的文本。而为了保证质量,录入和编辑功能仅对有足够资格的人开放,而不是像维基百科一样完全自由。此外该项目还试图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方式来逐渐实现梵藏汉跨语种文本间的大规模自动对齐,并进一步探索佛教经典之间存在的平行文本和互文性等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一些国际学界语文学的动态,《文献》或许也可以考虑予以介绍,并鼓励学者参与到共同的方法论讨论当中。此外,随着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比如后殖民主义、认知语言学等等对语文学的批评与冲击,造成语文学在美国学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出现了教职缩减的局面。西方语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纷纷做出回应,并试图提出解决办法来因应这一挑战。而目前国内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文献学的类似质疑,我想中国的文献学学者也有责任与其他语种的语文学家共同思考和面对。

第三点,《文献》以前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古典文献,但有一块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更重视一下,就是翻译文献。我们之前好像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本土著述,但实际上国外的文献和经典翻译到中国,这个过程是一个跨文化、跨区域的事件,可以放在更广阔的地域乃至全球史的层面上来讨论。一部翻译文献本身,除了有中国的背景,还有域外的背景在。这样一部文献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下转化的过程和命运,经常可以为文献的研究带来很多更加立体、更加

多面、更加有趣的话题。而且这样可能也会使我们的读者群更广一点,不仅仅局限于中文和历史的范围,而是可能会让更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关注到《文献》杂志,我想这样是不是也能部分地扩大期刊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呢?

## 学术引领者的担当

王博(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感谢张志清馆长与《文献》编辑部的邀请,办刊方向关系到刊物未来发展,实为大事,晚辈愚昧,借贵宝地斗胆发表一些个人浅见,如有不妥之处,尚请海涵见谅。

贵刊创刊自1979年,40年来陆续披露各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古、近代文献,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俨然已发展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享誉海内外,长期备受瞩目。就目前刊物而言,虽已是极好的,但如能在以下方面加以调整,则更有助于读者研究及学科发展。

其一,目前“文”较重而“史”较轻,两者所占比重并不均衡,后者内容尚有增加余地,以进一步提升对史学研究者的吸引力。如近年来以洛阳、长安等地为中心大量出土墓志等石刻材料,虽存在盗掘、伪刻等诸多问题,但意义重大,俨然已成为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之后的又一重要领域。贵刊今后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该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二,通过“专栏”等形式定期反映学术热点,并利用“卷首语”“主笔”直接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一个期刊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独特的表达功能,有生命力的期刊,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达及对当下热门话题加以采撷的意图。现在有许多期刊通过举办小型学术研讨会以提供探讨学术热点的场所,殊不知“专栏”本身便是一个最佳的探讨“场所”和“研讨会”。

其三,适当增加域外汉籍方面的内容,以从整体把握东亚汉籍发展脉络,促进该领域研究。如在东亚,作为印刷术的故乡,历史上东亚汉籍的刊印过程,基本上是沿着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和地区始于模仿中国,此后渐渐各有创造而发展起来的(早期基本为佛经,如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时代刊刻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以在中国元明时期民间流行的诗文选本《古文真宝》一书为例,虽该书地位不亚于此前的《文选》和此后的《古文观止》,但由于自明晚期起逐渐被人遗忘,国内极少有其传本,但据朝鲜半岛及日本对其翻刻本加以比较,则可较好恢复其原貌,域外汉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